

农村经济发展、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

雷汉云, 郝云平, 杨叶青

(新疆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新疆乌鲁木齐, 830012)

摘要: 利用我国 31 个省级行政区 2006—2016 年的面板数据, 使用静态、动态面板模型和 IV 工具变量法分析了普惠金融、农村经济与包容性增长的关系, 探讨了普惠金融在连接农村经济与包容性增长中所起的作用。研究表明: 普惠金融通过农村经济发展对包容性增长有明显的影响, 在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地方, 农村经济发展对包容性增长存在明显的促进作用。在此基础上, 从构建完整的农村普惠金融体系、创新的普惠金融服务模式、有区别的政府干预政策、推进农村产业化和提升教育水平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 包容性增长; 普惠金融; 农村经济; 区域差异

中图分类号: F832.1;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9)05-0090-09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 2017 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 巩固农村共享发展基础, 增强农村改革力度, 激活农业农村内生发展动力。可见, 要解决发展不均衡的矛盾, 就必须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从全球范围来看, 近年来大多数主要经济增长地区在财富分配方面都普遍呈现出“二八开”现象, 即 20% 的人占据 80% 的财富, 几乎世界上所有经济高增长的国家和地区都同时出现贫富差距、区域差距和工农城乡差距扩大的现象。这些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在过去的发展模式中, 弱势群体没能在增长中受益。在经济增长过程中, 往往创造出分布不均的新的经济机会, 低收入者受环境、市场的限制难以获得这些机会, 而包容性增长旨在为所有人提供享受经济发展成果的机会。此外, 政府应制定促进公平参与市场的政策, 创造新的经济机会, 确保社会中所有人, 尤其是低收入者有机会享受经济发展成果^[1]。

发展农村经济有助于减缓贫困, 这已被众多研究

者所证实。在发展中国家, 低收入者和贫困人口高度集中在农村地区, 农村经济的发展在减少农村贫困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与其他经济发展相比, 农村经济发展更有利于减少贫困^[2]; 农业产出增加 10% 将减少 5% 的贫困, 农业产出增加更有利于穷人增加财富^[3]。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高速发展, 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大幅提高, 然而, 长期以来以经济增长为发展目标、以城市建设为核心的发展导向等政策因素弱化了社会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关注度, 原本存在的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 引发了一系列突出问题, 例如: 土地快速非农化、农村空心化和农业主体老弱化等, 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使农民、农业、农村发展的权益受到损失^[4]。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1978 年的 343.4 元增加到 2016 年的 3 3616 元, 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从 1978 年的 133.6 元增加到 2016 年的 12 363 元。虽然总体上看, 人均收入呈稳步增长的态势, 但城乡收入差别明显呈扩大的趋势。如果将交通、教育、医疗、社会福利等附加因素考虑进去, 城乡差距还将进一步扩大。根据相关的统计数据, 2016 年我国贫困人口超过 6 000 万, 从分布的区域来看, 绝大多数分布在农村地区。收入低并不意味着个人能力低下。在我国的大部分地区, 农民收入普遍低于城

收稿日期: 2018-10-12; 修回日期: 2019-07-12

基金项目: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科基金面上项目“基于认知偏差的新疆地区居民金融素养对金融市场参与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2019D01A25);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常态下边疆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模式研究”(15BJY167)

作者简介: 雷汉云(1965—), 男, 湖南衡东人, 博士, 新疆财经大学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 普惠金融、金融工程与风险管理, 联系邮箱: leihy2004@aliyun.com; 郝云平(1993—), 男, 贵州水城人, 新疆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普惠金融、区域金融; 杨叶青(1994—), 女, 四川巴中人, 新疆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区域金融

市居民的收入, 其根本原因是农民没有得到均等发展的机会, 教育、金融服务、就业、社会福利等方面不平等直接限制了农民抓住机会的能力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其中, 无法获取农贷资金等金融服务是广大偏远农村地区普遍面临的重要问题。因此, 破解现有农贷资金配置固化的格局, 保障农贷资金公平地惠及农户^[5], 是新农村经济发展亟待解决的难题。以提升金融服务的深度、广度和便利性, 让各地区、城乡群众尤其是低收入者享有平等金融服务的普惠金融, 可以有效减弱金融机构对弱势群体的排斥, 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上更加公平合理, 并能从源头上消除贫困, 提升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综上所述, 包容性增长有利于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 并逐步提高其社会福利水平, 同时提高其参与金融活动的频率及参与社会的程度。而我国的实际情况是大多数贫困人口集中在农村和边远地区, 因此, 要实现包容性增长, 发展农村经济是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但农村经济发展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自然条件、农业的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的技术、信息资源、产业结构等都需要金融的支持。但从现有的研究文献来看, 大多数文献研究了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作用和普惠金融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而普惠金融在连接农村经济和包容性增长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目前尚未有研究文献涉及。为探究这一问题, 本文跳脱出已有文献从全国层面或者省市层面分析普惠金融和经济绩效的传统研究视角, 将关注点集中于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状况, 利用2006—2016年不同省份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同时, 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和IV工具变量法对回归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本文的创新点有二: 第一, 构建了农村经济发展、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之间关系的分析框架, 提出普惠金融通过农村经济发展促进包容性增长的假说, 并运用静态、动态面板模型和IV工具变量法进行了实证分析, 避免了普惠金融、农村经济发展与包容性增长三者之间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第二, 本文分区域进行回归, 并进一步加入普惠金融二次项与农村经济发展指标的交互项, 检验不同地区普惠金融通过影响农村经济发展作用于包容性增长的机制效应。

二、普惠金融连接农村经济发展和包容性增长的理论分析

(一) 普惠金融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

经济资源的配置决定着经济的发展程度, 新农村

经济的发展要求农村金融在资源的优化配置和资金融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这也是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先决因素^[6]。然而, 1998年金融机构基于利益最大化的战略规划, 从偏远地区、农村地区撤并其分支机构; 商业银行在2004年的股份制改造中, 很多大型银行将农村地区的服务网点进行了裁减, 削弱了农村金融服务的功能。这种市场失灵导致金融排斥的现象是造成城乡收入差别拉大、农村贫困人口增多的重要根源^[7]。

农村经济的发展受诸多因素的影响, 包括资金投入、农业产业化的形成、技术的变革、农村生态环境的建设等, 这些要素都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近几年金融服务水平虽然有较大的提高, 但其服务的广度和深度远未达到新农村经济发展对金融的需求。而普惠金融正是通过制度和体系, 在公平和透明的环境下, 让不同阶层的人群和不同地区的家庭能以合理的成本获得正规的金融服务, 可以为不同的消费者提供适合的金融服务^[8]; 同时, 普惠金融在提高居民的收入、增加社会福利、消除贫困、改善城乡二元结构的不平衡发展以及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9]。农村居民通过享受普惠性的金融服务不断积累资产, 合理配置剩余的收入, 改善自身资源禀赋和价值, 获取金融服务带来的收益。此外, 普惠金融能有效减少农村融资歧视, 驱动信贷资金流向农村地区, 增加农民获取金融服务的机会, 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 增强发展农村经济的动力。从宏观层面看, 金融发展、降低收入不平等、减缓贫困之间存在一种联系, 完善和健全的金融体系可降低基尼系数^[10]; 从微观层面看, 发展普惠金融能增强社会各阶层特别是低收入群体享受基本金融服务的可能性, 有利于改善收入差异、减少资源分配不均、减缓贫困、促进经济增长的包容性^[11-12]。因此, 构建普惠金融体系, 有利于缓解农村金融困境, 扩大金融对农村边远、贫困人群的覆盖面^[13], 进而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二) 农村经济发展促进包容性增长的作用机制

农村经济的发展在减少农村贫困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我国, 农村经济的发展受自然和历史因素影响。除此之外, 农村地区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福利制度和文化等五个维度长期遭受着社会排斥, 这是我国农村贫困的根本原因^[14]。我国农村地区基础设施落后, 贫困人口受教育程度低, 自我发展意识与能力不足, 同时在社会信息知情权、民主参与权、金融服务、社会保障权利等方面十分欠缺, 这些因素的

综合作用导致农村贫困人口脱贫难度加大,单纯依靠自身能力无法实现脱贫。因此,应通过新一轮的制度变革提高农民的市场能力并改善其社会权利,以此实现整体经济“效率”与“公平”的长期相互促进^[15]。通过农村经济的发展来带动农业产业化发展,增加农民的就业机会,提高农民受教育的机会和医疗健康、社会保障水平,走工业与农业协调发展之路,使工业与农业都能得到有效的、可持续的发展,即包容性增长^[16]。

(三) 普惠金融在连接农村经济发展和包容性增长中的作用

普惠金融发展的目标是使低收入人群尤其是弱势群体能低成本地获得诸如储蓄、贷款、保险等金融服务。金融发展使受益群体增加,并进一步使低收入群体获益,提高其收入水平^[17];而获取金融服务需要门槛,在金融发展前期,低收入群体很难获得金融支持,当金融发展日渐成熟以后,才能惠及贫困人口^[18]。金融体系的包容性发展必然会降低获得金融服务的不平等性、矫正资金在不同群体之间的歧视性分配,从而进一步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并遏制城乡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19]。事实上,穷人与富人在获取信贷资金的能力上存在明显的差异,金融发展更多地使富人收益,而穷人却受到排斥,导致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20]。但普惠金融发展不仅能够直接遏制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同时也会通过经济增长和贫困减缓两个渠道对城乡收入差距带来间接的减小效应^[21]。农村经济发展是普惠金融提高贫困群体收入水平、促进包容性增长的重要内容,一方面发展农村经济对普惠金融的减贫增收效果存在明显的调节效应;另一方面对于农村中的低收入群体,普惠金融不仅可以直接减贫增收(直接效应),而且能够通过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包容性增长的目标(中介效应)。

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确保农村人口尤其是农村贫困人口公平地获取贷款、保险、支付等基本的金融服务,这些金融服务对于农民提高收入、扩大生产、改进技术和提高效率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同时也能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改善农民的生活环境。而包容性增长旨在机会平等,主张将所有群体特别是“弱势群体”纳入经济体系中,让农民能够平等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并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使所有群体能够参与到经济活动中。趋利性使资源过多集中于城镇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发

展越来越不平衡,农民享受不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越来越贫穷,而城镇居民则越来越富裕,这与包容性增长的理念背道而驰。因此发展农村经济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关键。普惠金融致力于提高农村金融的覆盖面、有效降低金融服务成本、提升金融服务质量,解决农民和小微型经济主体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可获得性和便利性问题,使弱势群体能够普遍享受到金融服务,有效提高其获取收益的能力,增加其收入,减缓农村地区贫困,加速农村经济发展,实现包容性增长。此外,普惠金融还可以使金融资源配置于农村地区,提高农村金融使用效率和使用质量,获得金融服务的农民利用其提供的便利,创造收入,提高农村整体收入水平,有效发展农村经济,实现城镇和农村平等地获取金融资源,与包容性增长理念相一致。普惠金融有利于刺激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激发农村经济发展的潜在能力,提高农民获取机会的公平性,促进包容性增长目标的实现。但如果普惠金融的发展在结构、功能、金融制度、服务模式等方面与农村经济发展不匹配,不但不会促进包容性增长,甚至会有抑制的作用。

综合以上的分析,本文提出普惠金融通过农村经济发展促进包容性增长的假说。农村经济发展、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的相互关系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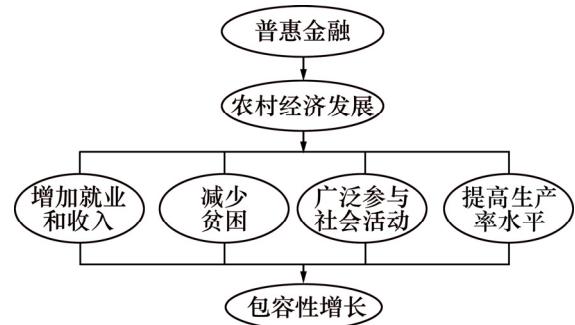


图1 农村经济、普惠金融和包容性增长的相互关系

三、模型设计、指标和数据来源

(一) 模型的构建

基于已有的研究文献,本文重点关注普惠金融能否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并推动包容性增长,以及其他影响因素在普惠金融促进农村经济增长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计量模型如下:

$$\begin{aligned} \ln Y_{i,t} = & \beta_0 + \beta_1 \ln RURAL_{i,t} + \beta_2 \ln IFI_{i,t} + \\ & \beta_3 \ln RURAL_{i,t} \times \ln IFI_{i,t} + \ln X_{i,t} + \varepsilon_{i,t} \end{aligned} \quad (1)$$

模型(1)中 $Y_{i,t}$ 表示包容性增长, $RURAL_{i,t}$ 表示农村经济, $IFI_{i,t}$ 表示普惠金融, $X_{i,t}$ 为控制变量, 主要包括教育程度、信息技术、产业结构、政府参与程度, $\varepsilon_{i,t}$ 为干扰项。

(二) 指标及计算方法

包容性增长的指标包含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公平机会的获取、成果的共享性等五个方面^⑤。普惠金融的指标分为三个维度: 地理维度(金融服务渗透性、人口维度的金融服务可得性、非银行类的金融服务), 使用情况(金融服务使用效率、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和服务质量(普惠金融发展深度、普惠金融机构的竞争性), 其中包括七个子维度, 以此来构建评价普惠金融发展程度的指标体系^⑥。

农村经济发展的指标包含农村人均收入、农村消费支出等 2 个指标体系。教育水平用每百人在校高中生人数来表示, 信息技术用每百人固定电话数量来衡量, 产业结构指标用第二、三产业产值占 GDP 的比重来表示, 政府参与程度用农、林、水事务支出占 GDP 的比重来表示。包容性增长、普惠金融和农村经济的指标测度分三步进行, 首先, 用式(2)、式(3)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bar{x}_i = \frac{x_i - m(x_i)}{M(x_i) - m(x_i)}, \text{ 正向指标} \quad (2)$$

$$\bar{x}_i = \frac{M(x_i) - x_i}{M(x_i) - m(x_i)}, \text{ 负向指标} \quad (3)$$

\bar{x}_i 表示量化处理后的指标值, x_i 为指标的实际值, $M(x_i)$ 表示该指标的最大值, $m(x_i)$ 表示该指标的最小值。然后, 根据式(4)、式(5)计算指标的权重。根据权重, 计算包容性增长和农村经济指标。

$$\lambda_i = \frac{S_i}{X_i} \quad (4)$$

$$\rho_i = \frac{\lambda_i}{\sum_{i=1}^n \lambda_i} \quad (5)$$

ρ_i 表示第 i 个维度的权重, $0 \leq \rho_i \leq 1$, λ_i 为各指标的变异系数, \bar{X}_i 代表各指标的平均值, S_i 表示各指标的标准差。

普惠金融指标依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编制的人类发展指数来计算, 见式(6):

$$IFI = 1 - \sqrt{\frac{(\rho_1 - E_1)^2 + (\rho_2 - E_2)^2 + \dots + (\rho_n - E_n)^2}{\rho_1^2 + \rho_2^2 + \dots + \rho_n^2}} \quad (6)$$

IFI 表示普惠金融发展指数, E_n 为普惠金融第 n 个维度值。各变量的基本统计描述见表 1。

据上述的计算方法, 将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和包容性增长、普惠金融和包容性增长、农村经济发展和普惠金融的交互项和包容性增长的关系用散点图描述(见图 2、3、4)。

图 2 显示, 农村经济发展与包容性增长呈正相关, 图 3 中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之间微弱的正向关系, 图 4 显示, 农村经济发展和普惠金融的交互项与包容性增长呈现很强的正相关。然而, 这种强的正相关关系并不意味着普惠金融通过农村经济促进了包容性增长, 其控制变量的影响并没有包含进来。本文的实证部分将通过加入控制变量来观察农村经济发展、普惠金融及农村经济发展和普惠金融的交互项的系数, 并进行分析。

分析数据选自《中国统计年鉴》、各省统计年鉴、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局的统计数据、各省人民银行分行和银监局的统计数据、《中国金融统计年鉴》、《区域金融运行报告》等 2006—2016 年的数据。

表 1 各变量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Variable	Definition	N	Max	Min	Mean	Median	s.d
lny	包容性增长指数	341	1.461	0.324	0.852	0.848	0.230
$lnifi$	普惠金融指数	341	-0.338	-2.839	-1.741	-1.651	0.503
$lnrural$	农村经济发展指数	341	5.361	2.894	4.105	4.113	0.525
$lnrural_lnifi$	普惠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交互项	341	-1.798	-10.559	-6.928	-6.951	1.427
$lngov$	政府干预	341	3.052	-1.022	0.752	0.703	0.745
$lninstru$	产业结构	341	-0.004	-0.389	-0.125	-0.123	0.065
$lnict$	信息技术	341	4.655	-0.895	2.842	2.992	0.970
$lnedu$	教育水平	341	0.950	-1.019	-0.513	-0.577	0.3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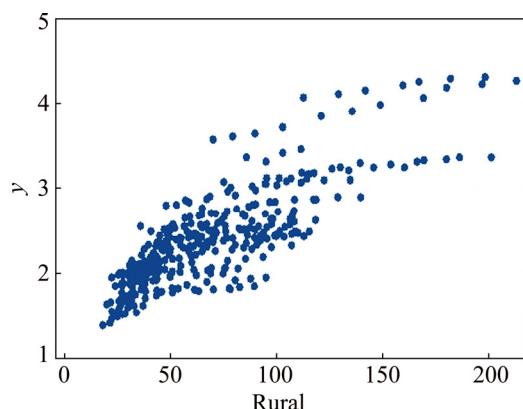


图2 农村经济发展和包容性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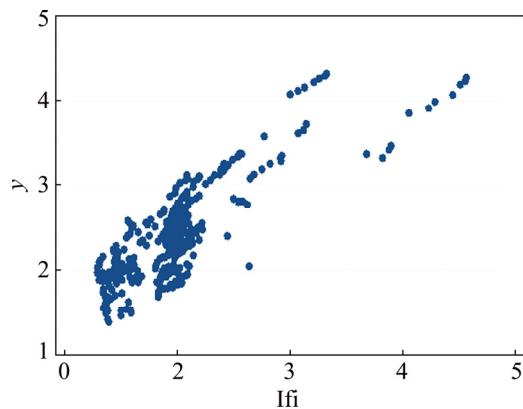


图3 普惠金融和包容性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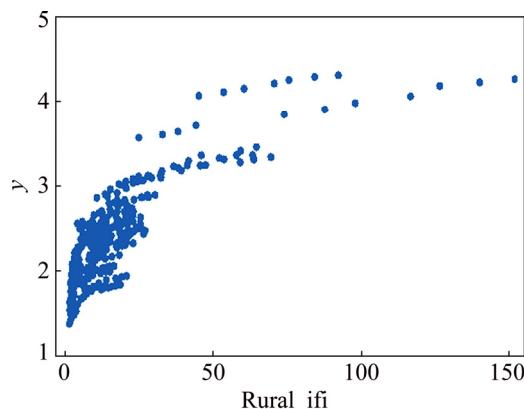


图4 交互项和包容性增长

四、实证分析

(一) 基本回归结果

本文中的包容性增长指数、普惠金融指数的测算中均含有多个指标,首先检验各变量的多重共线性,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值都远小于10,模型也不存在过度拟合的情况。本文所设定的计量模型主要是

通过逐步加入控制变量来分析农村经济发展、普惠金融及农村经济发展与普惠金融的交互项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在做实证分析之前,首先检验普惠金融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通过回归分析,普惠金融对农村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然后,利用2006—2016年的数据,采用Stata14.0软件和静态面板模型进行回归分析,见表2。

表2中的model(1)只加入农村经济变量,其回归系数为正且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农村经济发展对包容性增长有明显的影响,与图2一致。Model(2)加入普惠金融后,其回归系数也显著,说明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也有影响,但在加入农村经济发展和普惠金融的交互项变量的model(4)、model(5)、Model(6)、model(7)中,其回归系数都为正且在5%水平上显著,回归系数与model(2)中普惠金融回归系数和Model(1)中农村经济回归系数相比大幅提高。表2的结果显示,在其他控制变量不变的前提下,提升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可提高农村经济促进包容性增长的效应。相应的解释为普惠金融旨在为低收入者提供正规金融服务,使农民尤其是低收入者能够获得储蓄、贷款、保险等基本的金融服务,从而促进机会公平的获得和经济的发展成果,进而激发低收入者为提高收入的潜在能力,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包容性增长的实现。此外,农村的金融机构能够有目的地增加信贷资金的投放,抑制资金外流的现象,提高当地农村金融机构为当地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服务的积极性。

模型(2)、(3)、(4)、(5)中普惠金融的系数为正,模型(6)、模型(7)不相关且模型(6)的系数为负,表明普惠金融在一定的条件下对包容性增长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但如果我国普惠金融在金融制度、金融手段、基础设施和服务模式等方面与包容性增长不协调,那么,普惠金融就有可能对包容性增长不能起到促进作用,甚至起到抑制的作用。

(二) 区域样本回归

我国收入差距主要体现在城乡之间、发达地区和边远地区之间的差距上,而边远地区农村人口比重大、贫困人口多,主要以农业为主,是我国包容性增长重点关注的区域。根据我国学者关于包容性增长和普惠金融研究的结果^[7-8,22-24],中西部的经济增长指数及普惠金融发展水平都较低,但处于最低水平的都是边远地区,因此,本文按陆地交界为依据,将云南、广西、内蒙古、黑龙江、辽宁、吉林、甘肃、西藏、新疆等9个省和自治区划分为边疆地区,并考察与我国东、中西部在普惠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的交互项对包容性增长影响的区域差异,回归结果见表3。

表 2 农村经济、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的静态面板

Variable	Model(1)	Model(2)	Model(3)	Model(4)	Model(5)	Model(6)	Model(7)
<i>lnrural</i>	0.215*** (0.00581)	0.138*** (0.00888)	0.114*** (0.0128)	0.194*** (0.0290)	0.215*** (0.0273)	0.184*** (0.0235)	0.198*** (0.0234)
<i>lnifi</i>		0.106*** (0.0110)	0.0887*** (0.0100)	0.2420*** (0.0147)	0.2315*** (0.0144)	-0.1440 (0.0590)	0.1560 (0.0569)
<i>lnedu</i>			0.1607*** (0.0318)		0.0262*** (0.0050)		0.0177*** (0.0046)
<i>lngov</i>				0.0101 (0.0121)		0.00556 (0.0111)	0.2203*** (0.0127)
<i>lninstru</i>					0.315*** (0.0793)	0.340*** (0.0809)	0.327*** (0.0793)
<i>lnict</i>					0.0196 (0.0130)	0.0474*** (0.0098)	0.0435*** (0.0099)
<i>lnrural_lnifi</i>					0.4408** (8.4201)	0.5475** (9.0189)	0.5680*** (9.0171)
<i>cons</i>	-0.0315 (0.0293)	0.467*** (0.0486)	0.508*** (0.0577)	0.286*** (0.0997)	0.182* (0.0975)	0.220** (0.0967)	0.1590 (0.0986)
<i>Individual effect</i>	YES						
<i>Time effect</i>	YES						
<i>N</i>	341	341	341	341	341	341	341
<i>R</i> ²	0.6837	0.7190	0.7169	0.7330	0.7359	0.7652	0.7592

Note: ***, **, *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水平下显著, 括号中的数值为系数的标准差

表 3 全国与东部、中西部、边疆地区回归结果

Variable	National	East	Midwest	Frontier
<i>lnifi</i>	0.0583 (0.139)	0.0405 (0.290)	0.0134 (0.184)	0.754*** (0.157)
<i>lnrural</i>	0.169 (0.0286)	0.167 (0.0479)	0.122 (0.0303)	-0.2169*** (0.0090)
<i>lnrural_lnifi</i>	0.0862*** (0.0197)	0.0946*** (0.0134)	0.0763*** (0.0105)	0.0728*** (0.0077)
<i>lnrural_lnifi</i> ²	0.0177 (0.0116)	0.0144 (0.0200)	0.000190 (0.0196)	0.0409* (0.0234)
<i>lngov</i>	0.00374 (0.0102)	-0.2312* (0.1250)	-0.0255 (0.0225)	0.132*** (0.0362)
<i>lninstru</i>	0.307*** (0.0796)	0.501*** (0.151)	0.514*** (0.133)	0.3173** (0.0997)
<i>lnict</i>	0.0366*** (0.00962)	0.0533** (0.0232)	0.0436** (0.0186)	0.1884*** (0.0122)
<i>lnedu</i>	0.1524*** (0.0302)	0.2438*** (0.0346)	0.1222** (0.0512)	0.1123** (0.0399)
<i>cons</i>	0.556* (0.300)	0.617 (0.396)	0.383 (0.382)	1.835*** (0.438)
<i>Individual effect</i>	YES	YES	YES	YES
<i>Time effect</i>	YES	YES	YES	YES
<i>N</i>	341	110	132	99
<i>R</i> ²	0.782 6	0.844 1	0.693 4	0.856 5

Note: ***, **, *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水平下显著, 括号中的数值为系数的标准差

表 3 的统计显著性显示: (1)农村经济发展与普惠金融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均在 1% 水平下显著, 表明普惠金融在连接农村经济发展与包容性增长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中西部和边疆地区回归系数相对偏低, 且农村经济发展和普惠金融的二次项的回归系数只有边疆地区显著, 说明普惠金融只有发展到一定的水平, 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包容性增长才能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边疆地区在普惠金融的功能和结构上加以改进, 将进一步促进包容性增长。(2)教育对包容性增长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且为正, 表明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对普惠金融的认知程度, 对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包容性目标的实现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3)政府干预系数在边疆地区为正, 东部地区为负, 说明我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较低, 尤其是边疆地区, 政府在包容性增长的作用明显增强, 而东部地区需要发挥市场的作用, 弱化政府的干预。(4)第二、三产业产值占 GDP 的比重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值, 且在 5% 水平上显著, 说明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能够有效地推动我国包容性增长的实现。

(三) 稳健性检验

为解决模型(1)可能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做进一步的检验, 将模型(1)改进为:

$$\begin{aligned}
 \ln Y_{i,t} = \beta_0 + \beta_1 Y_{i,t-1} + \beta_2 \ln RURAL_{i,t} + \beta_3 \ln IFI_{i,t} + \\
 \beta_4 \ln RURAL_{i,t} \times \ln IFI_{i,t} + \varepsilon_{i,t}
 \end{aligned} \quad (7)$$

对模型(7)做一阶差分, 消除固定效应的影响:

$$\begin{aligned}
 \ln Y_{i,t} - \ln Y_{i,t-1} &= \beta_1 (\ln Y_{i,t-1} - \ln Y_{i,t-2}) + \\
 &\beta_2 (\ln RURAL_{i,t} - \ln RURAL_{i,t-1}) + \\
 &\beta_3 (\ln IFI_{i,t} - \ln IFI_{i,t-1}) + \beta_3 (\ln RURAL_{i,t} \times \\
 &\ln IFI_{i,t} - \ln RURAL_{i,t-1} \times \ln IFI_{i,t-1}) + (\varepsilon_{i,t} - \varepsilon_{i,t-1})
 \end{aligned} \tag{8}$$

同时, 采用 IV 工具变量回归进行稳健性检验, 将人均第一产业增加值指标作为稳健性检验工具变量, 结果见表 5。

根据表 4 和表 5 的结果, 普惠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的交互项的系数都显著且为正, 由此可得出结论, 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 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越高, 则农村经济发展促进包容性增长的效应越大。普惠金融的回归系数不显著或弱显著, 而普惠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的交互项的系数显著, 说明普惠金融只有结合农村经济发展才能实现包容性增长的目标, 证明了表 3 结果的可靠性和模型(1)的稳健性。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尽管包容性增长已成为国家和地区层面经济发展的目标, 许多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也意识到我国农村地区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目标的重点区域, 但鲜有文献来分析农村经济发展、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之间的关系。本文结合已有的文献, 提出了农村经济发展、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之间关系的分析框架, 并提出普惠金融通过农村经济促进包容性增长的假说, 同时利用 2006—2016 年的面板数据来检验这一理论假说。在加入影响包容性增长的其他控制变量后, 运用静态面板进行回归分析, 研究发现: 普惠金融通过农村经济对包容性增长有明显的影响, 在其他控制变量不变的前提下, 在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地方, 农村经济的发展对包容性增长存在明显的促进作用。同时, 本文采用动态面板数据和 IV 工具变量回归来检验模

表 4 农村经济发展与普惠金融的交互项与包容性增长——稳健性检验(动态 GMM)

Variable	Model(1)	Model(2)	Model(3)	Model(4)	Model(5)	Model(6)	Model(7)
<i>lnrural</i>	0.205*** (0.006)	0.097*** (0.010)	0.115*** (0.015)	0.206*** (0.031)	0.217*** (0.029)	0.211*** (0.030)	0.210*** (0.032)
<i>lnifî</i>		0.150*** (0.014)	0.161*** (0.020)	0.138* (0.080)	0.151 (0.077)	0.286 (0.081)	0.250* (0.106)
<i>lnedu</i>			0.036*** (0.010)		0.0142*** (0.004)		0.156*** (0.020)
<i>lngov</i>				0.192*** (0.042)		0.240*** (0.036)	0.079*** (0.021)
<i>lninstru</i>				0.612** (0.271)		1.355 7*** (0.451 7)	0.814*** (0.257)
<i>lnict</i>				0.106*** (0.036)		0.074*** (0.019 6)	0.049* (0.027)
<i>lnrural_lnifî</i>					0.0882*** (0.0228)	0.091*** (0.022)	0.123*** (0.022)
<i>N</i>	310	310	310	310	310	310	310
<i>AR(1)P Value</i>	0.004	0.242	0.091	0.364	0.361	0.127	0.135
<i>AR(2) P Value</i>	0.114	0.783	0.966	0.323	0.256	0.429	0.452
<i>Sargan Test P Value</i>	0.000	0.000	0.003	0.000	0.000	0.001	0.001
<i>Hansen Test P Value</i>	0.846	0.822	0.820	0.806	0.786	0.786	0.814
<i>Wald Statistics</i>	1 281.25	535.10	457.31	1 285.08	1 533.22	1 107.66	1 294.93
<i>Prob</i>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Note: ***, **, *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水平下显著, 括号中的值为系数的标准差

表5 农村经济发展与普惠金融的交互项与包容性增长——稳健性检验(IV工具变量法)

Variable	Model(1)	Model(2)	Model(3)	Model(4)	Model(5)	Model(6)	Model(7)
<i>lnrural</i>	0.213*** (0.006)	0.114*** (0.011)	0.052** (0.021)	0.586*** (0.083)	0.974*** (0.128)	0.287*** (0.076)	0.261** (0.125)
<i>lnifit</i>		0.130*** (0.012)	0.111*** (0.011)	0.822* (0.172)	1.318* (0.245)	0.851* (0.231)	1.263* (0.204)
<i>lnedu</i>			0.015 (0.011)		0.198*** (0.045)		0.150*** (0.036)
<i>lngov</i>				0.017* (0.009)		0.117*** (0.009)	0.118*** (0.009)
<i>lninstru</i>				0.405*** (0.079)		0.309*** (0.085)	0.358*** (0.073)
<i>lnict</i>				0.045*** (0.012)		0.056*** (0.012)	0.052*** (0.011)
<i>lnrural_lnifit</i>					0.248*** (0.044)	0.344*** (0.056)	0.259*** (0.061)
<i>cons</i>	-0.024 (0.028)	0.609*** (0.066)	0.749*** (0.089)	-1.271*** (0.341)	-3.162*** (0.591)	0.015 (0.353)	0.133 (0.575)
<i>N</i>	341	341	341	341	341	341	341
<i>R</i> ²	0.684	0.715	0.697	0.698	0.693	0.866	0.866
<i>Wald Statistics</i>	1 386	2 791	3 146	888	741	2 075	2 087
<i>Prob</i>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Note: ***, **, *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下显著, 括号中的值为系数的标准差

型的稳健性, 结果再次验证了上述结论。基于实证分析结果, 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 构建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普惠金融体系

发展农村普惠金融需要各种类型的金融机构通力合作, 应鼓励商业银行、政策性金融机构、合作银行携手创新金融服务模式; 为了满足农村金融机构和农户的资金需求, 可以向服务于农村的金融机构进行批发贷款; 不断培育和发展新型的农村金融机构, 引导社会资本积极参与到农村金融服务中来, 增加金融产品种类, 丰富农村金融机构类型; 针对中西部尤其是边疆地区中的贫困地区, 设立普惠发展基金, 鼓励公益性的小额信贷类型组织, 扶持低收入者、贫困农户的发展; 发展农村普惠金融应当利用科技手段将传统金融服务与互联网结合起来, 借助网络平台创新金融服务模式, 提高金融服务效率, 满足不同农户的资金需求。建立多层次、功能完善、监督有效的农村普惠金融服务体系, 真正解决农民贷款难和农村小微企业

融资难的金融服务问题。

(二) 创新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模式, 杜绝破坏市场秩序的伪创新

结合传统的金融服务模式, 运用现代的技术手段设计服务于农户和农村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模式, 是发展农村经济和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必然要求。然而, 金融机构在某些业务方面的创新并没有服务于实体经济, 一些互联网公司开展的金融创新业务已偏离了普惠金融发展的方向, 如“e租宝”“跑路潮”等使互联网金融的社会形象受到负面影响, 变成了“伪金融创新”。政府应加强监管, 防止变相的金融服务创新和金融欺诈, 让农户和农村小微企业真正享受到金融服务, 让老百姓的“钱袋子”更安全。

(三) 政府有区别的干预政策引导普惠金融促进区域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政府有所作为的确能够显著促进普惠金融发展^[25]。我国的中西部尤其是边疆地区市场化程度较

低,包容性增长和普惠金融的发展处于低级阶段,政府作用的效应明显。因此,在普惠金融和包容性发展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和边疆地区,政府应采取政策引导、提供金融基础设施和财税补贴等措施,缩短普惠金融和包容性发展处于低级阶段的时间,加快进入高级阶段的进程;在普惠金融和包容性增长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政府应弱化干预,适度监管,采取以市场调节为主的政策措施。

(四) 推进农村经济现代化的进程

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经济现代化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也是包容性增长的必要条件。东部地区的基础相对完善,只需要改善其硬件和软件的使用效率,而中西部和边疆地区的基础设施投入既要达到数量要求,同时也要充分保障质量,尤其是贫困乡村、贫困户应重点顾及。加大对农业的资金投入,设立用于农业发展的技术引进和技术改造的专项基金,同时引导金融机构和社会资金积极投入农业现代化建设。同时,推进土地使用权的流转,使农民土地经营权流转收益和土地权益得到有效的保障。

此外,农业产业化、农民的教育和农村的人才队伍建设特别是边疆地区农村的教育投入、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都是提高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和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助推器。

注释:

- ① 具体二级指标和计算过程参见:雷汉云. 中国边疆地区包容性增长的时空演变——对我国中、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阶段性评价. 上海经济研究, 2016(10): 108-115.
- ② 具体二级指标和计算过程参见:雷汉云. 边疆地区普惠金融发展差异的阶段性评价——与我国中、东、西部地区的比较.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7(8): 119-123.

参考文献:

- [1] AII L, SON H H. Measuring inclusive growth [J]. Asian Development Review, 2007, 24(1): 11-31.
- [2] RAVALLION M, DATT G. How important to India's poor is the sectoral composition of economic growth[J].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1996, 10(1): 1-26.
- [3] SUKHDEV PAVAN. Agriculture can reduce poverty[R]. The Times of India, Goa, 2011, Nov.7.
- [4] 龙花楼, 李裕瑞, 刘彦随. 中国空心化村庄演化特征及其动力机制[J]. 地理学报, 2009, 64(10): 1203-1213.
- [5] 温涛, 朱炯, 王小华. 中国农贷的“精英俘获”机制: 贫困县与非贫困县的分层比较[J]. 经济研究, 2016(2): 111-125.
- [6] 刘金全, 刘达禹. 农村金融发展与农业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

- 联机制研究——基于分省数据 PLSTR 模型的实证检验[J]. 数量经济研究, 2015(3): 22-35.
- [7] 王修华, 关键. 中国农村金融包容水平测度与收入分配效应[J]. 中国软科学, 2014(8): 150-161.
- [8] 焦瑾璞, 黄亭亭, 汪天都, 等. 中国普惠金融发展进程及实证研究[J]. 上海金融, 2015(4): 12-22.
- [9] 王曙光, 王东宾. 双重二元金融结构、农户信贷需求与农村金融改革——基于 11 省 14 县市的田野调查[J]. 财贸经济, 2011(5): 38-44.
- [10] BECK T, DEMIRGUC-KUNT A, HONOAH P. Access to financial services: Measurement, impact, and policies[J].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2009, 24(1): 119-145.
- [11] HANNIG A, JANSEN S. Financial inclusion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Current policy issues[R]. Tokyo: ADBI (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e), 2010, 259: 8-19.
- [12] MOOKERJE R, KALIPIONI P. Availability of financial services and income inequality: The evidence from many countries[J]. Emerging Markets Review, 2010, 11(4): 404-408.
- [13] 马九杰, 吴本健, 周向阳. 农村金融欠发展的表现、成因与普惠金融体系构建[J]. 理论探讨, 2013(2): 74-78.
- [14] 银平均. 社会排斥视角下的中国农村贫困[M]. 北京: 中国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8.
- [15] 周文, 孙懿. 包容性增长与中国农村改革的现实逻辑[J]. 经济学动态, 2011(6): 82-86.
- [16] 周阳敏, 宋利真. 中国农业包容性增长的理论与实证研究[J]. 农业技术经济, 2012(2): 20-27.
- [17] GALOR O, ZEIRA J.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macroeconomics [J].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93, 60(1): 35-52.
- [18] TOWNSEND R M, UEDA K. Financial deepening, inequality, and growth: A model-based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J].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06, 73(1): 251-293.
- [19] CLAESSENS S, FEUEN E. Financial sector development and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World Bank Working Paper No. 89, 2006.
- [20] MAURER N, HABER S. Related lending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Mexico[J].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007, 67(3): 551-581.
- [21] 刘金全, 毕振豫. 普惠金融发展及其收入分配效应——基于经济增长与贫困减缓双重视角的研究[J]. 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9(4): 37-46.
- [22] 宋斌. 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与区域比较研究——基于包容性增长视角的分析[J]. 宏观质量研究, 2013(3): 63-71.
- [23] 陈三毛, 钱晓萍. 中国各省金融包容性指数及其测算[J]. 金融论坛, 2014(9): 3-8.
- [24] 陈银娥, 孙琼, 徐文赟. 中国普惠金融发展的分布动态与空间趋同研究[J]. 金融经济学研究, 2015(6): 72-81.
- [25] 粟芳, 方蕾. “有为政府”与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基于上海财经大学 2015“千村调查”[J]. 财经研究, 2016(12): 72-83.

(下转第 117 页)